



地区的城市与市镇是中国戏曲各种剧种声腔最主要的吸纳与聚集之地；京杭大运河水道是中国戏曲各种剧种声腔最重要的传播通道。对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苗菁有着深入的研究。在他所撰写的《水路与戏路》中，特别强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里有对中国戏曲发展最重要的需求者、欣赏者、研磨者及供养者。这种现象，对明清中国戏曲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有这样一个规律，即当某一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戏曲声腔，并经过无数艺人不断演出与改进获得成功，一般都要试图走出本地，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机会，甚至可能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剧种声腔。而大运河的存在，成为地方戏曲生发、繁荣、传播最有效的途径。

典型的例子就是元代末年兴起的海盐腔，首先以运河岸边的嘉兴为中心，在附近区域传播。明嘉靖时，开始走出这个区域，沿京杭大运河一线向外传播。向西到了湖州；向北沿运河到了苏州。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海盐腔开始溯京杭大运河北上，先到扬州，接着又继续向北传播，至少在明嘉靖后期，就已传到了北方运河城市今山东临清。写成于这段时间，反映临清地区生活的小说《金瓶梅》就曾多次提到“海盐子弟搬演戏文”，恰为最好的佐证，可见此时海盐腔已经在临清这样一个北方城市扎下了根。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又提到，那些唱海盐腔的艺人都是苏州人。这又说明，传到临清的海盐腔很有可能是从苏州地区溯运河而上来到山东的。此外，海盐腔沿运河还传到了北京，并进一步在整个北方地区流传。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成书的《丹铅总录》中说：“近日多尚海盐南曲……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更数十百年，北曲亦失传矣。”可见嘉靖时期，海盐腔作为南曲的代表，已在中国北方盛行起来。

清后期，戏曲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京剧的兴起。说到京剧，不能不提到徽班进京。徽班是以演唱“二黄腔”为主的戏班，兴起于安徽南部。在当地产生较大影响后，和很多地域性剧种声腔一样，徽班也走出了安徽南部，第一个重要去处便是扬州。

《扬州画舫录》提到，“安庆有以二簧调来者”。在扬州，徽班的演唱很快就以特色独具、技艺高超超过其他剧种声腔，也自然引起上层社会的注意。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帝八十大寿，朝廷命浙江盐务承办皇会。闽浙总督伍拉纳便派遣在扬州影响较大的徽班“三庆班”从京杭大运河顺河而上，进京为皇帝贺寿。进京后，三庆班很快便以阵容强大、演技出色赢得北京观众的普遍赞誉。此后，又有众多徽班沿京杭大运河进入北京。于是，徽班在北京站稳了脚跟，二黄腔成为京城最盛的声腔，并逐渐演变成今天人们所熟知的京剧。

京杭大运河之所以能够成为各种剧种声腔传播的重要通道，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苗菁看来，最根本原因是京杭大运河沿线为当时中国交通最发达、商业活动最活跃、人口也相对集中的地区，对戏曲的需求最大、最强烈。除此之外，明清时期，各地商人纷纷向京杭大运河沿线及沿岸城市与市镇集中，这对各地剧种声腔向其聚集、传播具有促进、带动作用。与此同时，京杭大运河沿岸城市与市镇是达官贵人、豪商大贾最集中的地方，他们凭借财力蓄养家庭戏班，并借此写戏、听曲、赏戏，或钻研戏曲技艺，或以戏会友，或以“家班”为自我宣传与交际应酬的途径，促进了南北戏曲艺术的发展与繁荣。与此同时，明清时期皇帝沿京杭大运河的几次南巡，对戏曲在京杭大运河沿岸城市与市镇的聚集与传播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吴越江南

大运河沿岸，江南永远是一派柔情似水，温润雅致。此处河宽、桥密、塘多、漾清，物产丰饶，自古繁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吴越文化更是底蕴深厚，蔚为大观。

舟楫往来，桨声欸乃，水动波亦动，琴奏箫亦鸣……古戏台上，水乐缠绵，乐如水，水如乐，听得人深深地醉了。在江南运河沿岸，不仅有着水磨调，丝竹声，也有着鸂班，古戏

京杭大运河之所以能够成为各种剧种声腔传播的重要通道，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苗菁看来，**最根本原因是京杭大运河沿线为当时中国交通最发达、商业活动最活跃、人口也相对集中的地区，对戏曲的需求最大、最强烈。**